



追究中国责任 它在最灾难性的 当今疫情:COVID-19

中国与新冠肺炎无党派委员会报告

由传统基金会召集

由美国第六任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利夫主持

传统基金会中国与新冠肺炎无党派委员会

主席

约翰·拉特克利夫 (John Ratcliffe) 法学博士,美国第六任国家情报总监、前美国众议院议员
来自德克萨斯州第4区。

委员

罗伯特·C·奥布莱恩,美国全球战略主席、第27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海蒂·海特坎普 (Heidi Heitkamp),芝加哥大学政治研究所所长,前北达科他州美国参议员。

马修·博明 (Matthew Pottinger),保卫民主基金会中国项目主席、第32任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

Robert R. Redfield 医学博士,病毒学家,曾任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以及有毒物质和疾病登记署署长。

Jamie Metzl, OneShared.World 创始人兼主席,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官员,世界卫生组织人类基因组编辑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

John Yoo,法学博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Emanuel S. Heller 法学教授。

Robert Kadlec 医学博士,医生,前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助理部长。

新美国安全中心兼职高级研究员、前美国国务院助理部长戴维·费思
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国务卿。

本文全文可在此处找到: <https://report.heritage.org/sr286>

传统基金会 | 214 Massachusetts Avenue, NE | 华盛顿特区 20002 | (202) 546-4400 | heritage.org

此处所写的任何内容均不应被理解为必然反映传统基金会的观点或试图帮助或阻碍国会通过任何法案。

内容

主席致辞..... 1

执行摘要..... 3

疫情给全球造成的损失前所未有..... 5

 美国新冠疫情的代价..... 7

 结论..... 12

中国政府问责案例..... 13科学与运作环

 境..... 13中国共产党的系统性掩

 盖..... 16

 结论..... 23

中国的法律责任..... 25

 根据《外国主权豁免法》可能提起诉讼的原因..... 25

 A. 外国主权豁免法的范围..... 25

 B. 潜在缔约方..... 27

 C. 先前成功的 COVID 病例。..... 28

 D. 具体的可能诉讼原因..... 29 E. 寻求救

 济..... 33

 FSIA 中的修订..... 33

对美国要求中国对其在新冠疫情中扮演的角色负责的政策建

议..... 35

 对国会的建议..... 35

 对总统的建议..... 38

结论..... 43

委员简历..... 45

致谢..... 53

尾注..... 54

要求中国对其在最严重问题上扮演的角色负责

当今时代的灾难性流行病： COVID-19

无党派委员会的报告
关于中国和新冠肺炎疫情

由传统基金会召集
由美国第六任国家情报总监约
翰·拉特克利夫主持

董事长致辞

美国传统基金会中国和新冠肺炎疫情无党派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审查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具破坏性的流行病之一的相关事实和情况，评估和计算中国政府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并提出要求中国承担责任的建议。

我们准备了这份报告和随后的建议，供美国总统、国会和美国人民审议。由共和党 and 民主党组成的九人委员会共同努力，一致提交了这份报告，没有异议。

我们工作的目标是寻求真相、加强问责制并维护美国人民的利益和福祉。为此，我们制定了四条不同的工作路线，旨在挖掘事实、评估影响并确定可行措施。

1. 数据分析。委员会对数据进行了严格的分析，以确定美国因 COVID-19 而遭受的巨大人力和经济损失。目的是全面了解这场流行病对美国社会的影响。

2.案件。全面审查公开来源的事实和现有证据是委员会工作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我们审查了过去四年中出台的数百份文件和报告,从美国国会到调查记者的报道,再到中国公民的叙述。在此过程中,我们审查、咨询和考虑了来自全球个人网络的无数权威书籍、科学论文和作品,这些作品发掘出了非凡的材料。我们还举行了两次虚拟听证会,并与2020年在美国政府工作的参与疫情工作的专家、数据分析师和官员进行了交谈。这次深入审查的目的是对2019年底至2020年初关键时期中国发生的事件建立清晰的叙述。

3.法律措施。为了追究责任和伸张正义,委员会

任务已评估已证实和确立的法律和国际诉讼原因、原则和理论,以支持各种潜在的补救措施和案件选择。我们为应对COVID-19后果可采取的法律行动提供了指导。

4.行动建议。委员会制定了

可操作的建议概述了美国政府应立即采取的措施,以追究中国的责任并确保我们国家的安全和恢复力。在近五年无所作为之后,我们呼吁总统和国会立即采取果断行动。

担任这个受人尊敬的委员会主席是我的荣幸。我感谢我的同事们愿意提供服务并提供专业知识。我们共同努力,尊重我们国家所秉持的价值观和原则,确保我们公民的健康和福祉。

我还感谢传统基金会的领导力和远见,召集了我们这个无党派委员会。

约翰·拉特克利夫
主席

中国和新冠肺炎疫情无党派委员会
第六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
前国会议员

2024年7月

执行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人力和经济损失,这种损失将持续几代人。疫情导致 2800 万人丧生,梦想破灭,弱势群体陷入贫困,经济遭受数万亿美元的损失。据估计,仅美国就因新冠肺炎死亡 110 万人,损失 18 万亿美元。

美国传统基金会成立了中国与新冠肺炎无党派委员会(简称“委员会”),开展事实调查,确定此次疫情给美国带来的巨大损失,根据中国的科学和运作环境,审查有关病毒起源和传播的所有现有证据,审查并提供法律选择,并根据调查结果为美国提供可实施的政策建议。委员会的报告不排除许多其他政府、机构和个人可能在本次疫情中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报告发现,中国在积极反对有关病毒及其传播的诚实、透明和问责方面独树一帜。中国政府的这种行为,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可能是新冠肺炎疫情的近端起源。

在本报告中,委员会记录了有关疫情的几个重要事实,这些事实与中国宣传的说法相矛盾。委员会发现,现有证据的平衡表明,疫情最初是由武汉病毒研究所(WIV)的一次研究相关事件引起的,该研究所因冠状病毒相关研究而享誉国际,而不是源于该市市场上出售的野生动物。

委员会发现,中国政府没有采取适当措施保护武汉病毒研究所免受潜在污染的例子有很多。委员会指出,实验室的几名科学家疑似患病,中国政府在疫情爆发的关键早期几周和几个月内,向本国公众、科学界和全世界隐瞒了与该疾病高度相关的信息。委员会记录了中国政府如何销毁样本、隐藏记录、监禁提出基本问题的中国记者、对中国科学家实施封口令,并坚决阻止任何有意义的国际调查疫情起源。委员会还发现,中国发布了有关疫情的虚假数据。这些和其他行动都是由中国政府采取的。

尽管中国签署了一项国际协议,该协议要求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及时、准确、详细地提供有关该疾病的信息,但中国政府并未采取任何行动。

所有政府和机构都必须全面审查其在新冠疫情之前和期间的行为,并采取适当的纠正措施,以尽量减少当前和未来的风险。尽管这一进程在美国并不像它应该的那样先进,但美国政府的行政和立法部门都已采取了重大措施。还需要做更多。在这方面,中国的行为再次独树一帜,将中国、美国和世界置于巨大且不必要的风险之中。

鉴于中国拒绝履行问责制,包括在国际机构中扮演阻碍者角色,像本委员会这样的努力至关重要。在承认其他国家和机构存在缺陷的同时,本报告努力评估中国的责任并提出措施让中国承担责任。报告在此找到了中国政府和各种中国企业实体可以被追究责任的多种法律依据。该委员会还概述了美国政府可以实施的17项政策建议,以加强威慑力、透明度和问责制。

虽然委员会主要从美国所付出的代价以及美国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追究中国责任的角度来分析疫情,但其结论并不局限于美国。我们鼓励其他国家利用委员会创建的模型来调查疫情给本国社会造成的人员和经济损失,并探讨如何追究中国的责任。

正如确立问责制和责任制是任何有效国内法律体系的必备工具一样,这些原则也必须应用于这一背景。面对前所未有的全球挑战,另一种选择是冒险赌博,未来可能出现更严重的流行病,夺走数百万甚至数十亿人的生命。

疫情给全球带来前所未有的损失

新冠肺炎疫情被认为是世界历史上七大最致命的瘟疫之一,给全球带来了巨大的人员和经济损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因此,在查看美国的具体成本估算之前,必须了解疫情在全球背景下的影响。例如,截至 2024 年 6 月,《经济学人》估计全球因新冠疫情导致的超额死亡人数已达 2800 万,其中包括 110 多万美国人。³

除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外,疫情还对经济造成了惊人的影响。仅 2020 年一年,全球 GDP 就下降了 3.4%。⁴同年,约 90% 的国家经济产出萎缩。⁵

世界银行将此次经济动荡称为“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全球经济危机”,并指出全球贫困率“一代人以上首次”上升。⁶ 2020 年至 2021 年,疫情导致约 9700 万人陷入贫困。⁷ 低收入国家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⁸

2020 年,全球失业率飙升至 6.5%,高于上一年的 5.4%。⁹ 失业率在各个人口群体中分布不均,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调查,女性失业率高于男性。¹⁰ 仅在 2020 年,疫情就通过工时损失抹去了相当于 2.55 亿个全职工作岗位。这些损失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南欧和南亚”尤为严重。¹¹ 疫情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预计 2023 年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几个低收入地区的失业率将高于疫情之前。¹²

儿童因 COVID-19 承受了不成比例的负担。联合国称此次疫情是其 75 年历史上“儿童面临的最严重危机”。¹³ 儿童不仅面临疾病和死亡,还经历了失去家人、因隔离和学校停课而孤立无援、粮食短缺,以及在就医方面遇到困难,而这些疾病如果与病毒无关,就不被视为优先事项。

教育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2020 年疫情高峰期,全球有超过 15 亿儿童失学。¹⁴ 到 2022 年,学校全部或部分关闭仍将影响超过 6.16 亿儿童。¹⁵

据估计,到 2022 年 2 月,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70% 的 10 岁儿童被视为功能性文盲,高于疫情前的 57%。¹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高收入国家的儿童也经历了严重的学习损失,因为平均阅读和数学测试成绩大幅下降:在 OECD 国家的 15 岁学生中,25% (四分之一)的学生在 2022 年被认为是低绩效者。¹⁷

在心理健康方面,疫情期间,全球年轻人和老年人中重度抑郁症发病率上升了 27.6%,焦虑症发病率上升了 25.6%。最容易患上精神疾病的是年轻人和女性。¹⁸一些国家的精神疾病发病率甚至翻了一番。¹⁹人们挣扎于死亡、疾病、孤立、悲伤、失业和收入损失以及普遍的不确定性中,家庭和社区的社会结构瓦解。

长期 COVID 是一种常常使人衰弱的疾病,在至少 10 %-20% 的感染中发生,影响包括儿童在内的所有年龄段的人。²⁰儿童被认为特别容易患上长期 COVID;²¹仅在美国,估计就有 600 万儿童患有这种疾病。²²

已发现 200 多种长期 COVID 症状会影响多个器官系统。²³这份详尽的清单包括疲劳、呼吸困难、神经认知影响和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等多器官、多系统、复发缓解症状。虽然神经系统影响曾经被认为是罕见的,但这些病例“在成人和儿童中越来越常见”。²⁴

此外,在长期 COVID 患者中,嗅球、大脑、心脏、肺和其他部位都出现了一系列放射学异常。长期 COVID 还可能引发其他慢性健康问题,如糖尿病和心脏或肝脏疾病。²⁵疾病负担从轻微症状到严重残疾不等,其规模使其成为一项巨大的、持续的全球医疗保健挑战。²⁶

疫情造成的全球成本无疑是巨大的,但由于缺乏个别国家的成本数据等限制,本报告仅关注美国的美元成本。本委员会鼓励其他国家的组织和政府使用其国家的统计数据来计算类似的数字。以下几页为美国制定的计算提供了一个路线图,其他国家可以使用该路线图来创建自己的成本模型并加入美国的行列

要求中国共产党对其行动和不作为承担经济责任。

美国新冠疫情的代价

本节旨在帮助政府官员和公众了解美国这场毁灭性疫情的真实代价。

总额。委员会估计,截至 2023 年 12 月,美国新冠疫情造成的总成本已达到 18.007 万亿美元。

表 1 显示了各主要类别的总成本。

作为参考,根据美联储的数据,2022 年美国财富的总净值为 135.555 万亿美元。27换句话说,迄今为止,疫情造成的总成本约占美国财富的 13%。以下部分将介绍每个类别的成本计算。

死亡。COVID 死亡的货币成本可以用一种称为统计生命价值 (VSL) 的指标来计算。VSL 衡量个人必须支付多少钱才能承担给定活动导致的额外死亡风险。

VSL 数字可以从市场或调查数据中推断出来。例如,如果一份工作每年的额外死亡风险为 1/10,000,而该工作每年的薪酬比类似工作高 1,000 美元,那么 VSL 就是 10,000,000 美元。每 10,000 名工人将总共获得 10,000,000 美元 (10,000 名工人 x 每位工人每年额外获得 1,000 美元),平均而言,其中一人将死亡。因此,10,000,000 美元是为一人丧生的风险支付的。

不应将 VSL 与终生收入或工作产生的利润相混淆。它衡量的是个人愿意接受死亡风险略有增加以换取收入增加的程度。

如果将 COVID 疫情视为增加死亡风险的事件,我们可以使用 VSL 估算出一个美元数字,如果在疫情爆发后将这笔钱发放给所有美国家庭,则将被视为对死亡风险增加的公平补偿。²⁸然而,并非每一次死亡都会导致相同的剩余寿命损失。显然,老年人的平均剩余寿命比年轻人少。此外,COVID 对所有年龄组的影响并不相同,对老年人口的影响更大。

因此,我们使用统计生命年 (VSLY) 的常数值来计算不同年龄组的 VSL,并将统计预期剩余寿命年数的 VSLY 相加。这种方法对生命的每一年都一视同仁。

在我们的计算中,我们使用了 50 万美元的 VSLY,这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使用的数字一致。²⁹美元

未来 VSLY 的数据使用折现率转换为现值。折现率会根据货币的时间价值进行调整,因为未来的一美元比现在的一美元价值要低。表 2 中报告的 VSL 数据基于 3% 的折现率。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每周都会收集美国所有死亡人数的临时统计数据,包括与 COVID-19 相关的死亡人数。30自 2020 年大流行开始以来,已有 984,716 人死亡,其中 COVID-19 是根本原因,1,138,763 人死亡,其中 COVID-19 是多种原因之一。

然而,一些死于 COVID 的人可能从未检测出阳性。其他人可能死于与疫情无直接关系的事情 例如,高危人群可能因可能接触 COVID-19 而逃避医疗救治,或者医疗服务提供者可能推迟了服务。

因此,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死于 COVID 的人数,我们研究了 CDC 对与 COVID-19 相关的“超额死亡”的追踪 该指标衡量了每周死亡人数超过疫情未发生时预期死亡人数的程度。我们使用 CDC 按年龄组细分的超额死亡指标来捕捉不同年龄段死亡风险增加的变化。

表 2 列出了 CDC 按年龄组提供的临时死亡率数据。

新冠疫情爆发前的死亡率是 2017 年至 2019 年死亡率的平均值,显示在“2017 年至 2019 年每 100,000 人平均死亡率”一栏中。美国在新冠疫情期间经历的较高死亡率以平均值显示在“2020 年至 2022 年每 100,000 人平均死亡率”一栏中。将平均死亡率的百分比变化乘以“2020 年至 2022 年人口平均值”,再乘以三以计算三年的死亡人数,即可得出“3 年超额死亡人数”。同样,对于所有年龄类别, 2020 年至 2022 年的超额死亡人数总计为 1,476,457 人。将每个年龄组的超额死亡人数乘以其相应的 VSL 即可得出死亡人数增加的总成本。

根据疫情三年来死亡风险的变化进行调整

使用 500,000 美元的 VSLY 可获得 8.625 万亿美元的总价值。

收入损失。将新冠疫情爆发前的经济预测与疫情期间的实际数据进行比较,可以大致了解疫情对整个经济的影响。虽然由于同期经济前景发生了其他变化,因此这不是一个完美的衡量标准,但疫情应该代表了过去几年新信息的主要数量。

表格1

新冠肺炎疫情总成本

物品	成本 (万亿美元)
死亡人数	8.625万亿美元
收入损失	1.825万亿美元
慢性疾病	6.026万亿美元
精神健康	1.096万亿美元
教育损失	0.435万亿美元
总成本	18.007 万亿美元

资料来源:传统基金会计算。

SR286 A遗产.org

我们将通过将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数据与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2020年1月的基线预测 (该预测是在疫情爆发前计算和发布的) 进行比较, 计算出经济的收入损失。

GDP 衡量美国国内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 因此也衡量美国人从这些生产中获得收入。应该注意的是: (1) 名义 GDP 可以分为实际 GDP (以不变价格计算商品和服务的价值) 和隐含 GDP 平减指数 (衡量总体价格水平的变化); (2) 实际 GDP 和隐含 GDP 平减指数的变化应分开跟踪, 这样就不会将没有实质好处的价格水平上涨误认为是实际收入的增加。

为了计算疫情对实际 GDP 的影响, 我们将当前实际 GDP 数据与 CBO 基线数据之间的差值乘以隐含 GDP 平减指数。这样就得到了一个数据系列, 该系列使用没有疫情时预期的价格水平来评估实际产出。

从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2020 年 1 月的名义 GDP 基线中减去这个替代系列, 就可以计算出控制通胀的情况下国家的收入损失, 这将在下面的单独部分中计算。

将疫情三年间的名义 GDP 差异相加, 可得出美国总产出减少 1.825 万亿美元。

2020 年第一季度至 2022 年第四季度期间, 实际 GDP 平均比 2020 年初的预测低 2.5%。

慢性病。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感染 COVID-19 会导致几天的流感样症状,然后恢复正常。

然而,有些患者报告称,感染后症状会持续数月。这被称为“长期 COVID”。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和人口普查局的调查,大约 15 % 的美国成年人曾经感染过长期 COVID。³¹ 美国成年人口为 2.609 亿,这相当于 4020 万例病例。

目前尚不清楚长期 COVID 的典型持续时间。不过,最近一项估计表明大多数症状在一年内消失。³²

衡量长期 COVID 危害的相关经济指标是质量调整生命年 (QALY)。³³ QALY 计算健康状况良好的年数,每年的评分在 1 (完全健康)和 0 (死亡)之间。

我们使用与哈佛大学经济学家 David Cutler 和前美国财政部长 Lawrence Summers 相同的标准来衡量长期 COVID 导致的生活质量下降,他们根据与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比较,将每例病例的危害定为 -0.25 到 -0.35。³⁴

使用代表一年 0.70 QALY 的长期 COVID 病例的中心估计值,以及我们之前使用的统计生命年价值 500,000 美元,美国在三年大流行期间因长期 COVID 造成的总损失为 6.0 万亿美元。

心理健康。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和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约有 25 % 的成年人报告出现焦虑或抑郁症状。³⁵ 这究竟是由疾病本身还是各国为抗击疾病而实施的政策造成的,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因为如果不是因为这种疾病,这些措施都不会采取。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焦虑和抑郁症状与新冠肺炎相关病例的流行之间存在联系。³⁶ 2020 年 7 月至 2021 年 1 月期间,焦虑和抑郁的流行率达到 35 % 以上。³⁷ 以 2.609 亿成年人口计算,焦虑或抑郁症病例在 6500 万 (25%)至 9100 万 (35%)之间。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表示,抑郁症每年通常影响 1600 万成年人,约占总人口的 6%,而且焦虑症常常伴随抑郁症。³⁸ 这意味着三年的疫情导致了额外的 4900 万例抑郁或焦虑病例 (使用低端数字 25% 进行计算)。

患者愿意为抑郁症治疗支付的费用估计约为家庭收入的 10%。³⁹ 支付意愿是一个合适的衡量标准,因为它可以反映出让某人过上与 COVID 感染时一样好的生活所需的公平补偿的全部价值。

表 2

各年龄段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增加带来的成本

年龄组 (岁)	2017-2019 平均的 死亡率*	2020-2022 平均的 死亡率*	更改自 大流行	2020-2022 人口 平均的	预期的 额外的 死亡人数	的价值 统计 生命 (百万美元)	每单位成本 人	总成本 (万亿 美元)
小于 1	559.3	550.3	-0.01%	3,621,316	-974	15.061 美元	-4,052 美元	-0.015 美元
1-4	23.9	24.9	0.00%	15,359,304	461	14.966 美元	449 美元	0.007 美元
5-14	13.4	14.3	0.00%	41,557,202	1,039	14.578 美元	364 美元	0.015 美元
15-24	71.3	84.8	0.01%	42,900,991	17,418	13.872 美元	\$5,632	0.242 美元
25-34	130.1	167.7	0.04%	45,692,036	51,449	12.953 美元	\$14,585	0.666 美元
35-44	196.4	264.0	0.07%	42,977,045	87,200	11.762 美元	\$23,864	1.026 美元
45-54	396.6	484.5	0.09%	40,580,269	107,010	10.240 美元	\$27,003	1.096 美元
55-64	885.3	1,042.9	0.16%	42,671,187	201,835	8.387 美元	\$39,672	1.693 美元
65-74	1,779.6	2,068.6	0.29%	33,293,955	288,625	6.225 美元	53,966 美元	3.931 美元
75-84	4,389.0	5,066.8	0.68%	16,287,943	331,183	美元 79,924	美元 2.037	美元
85 或以上	13,417.6	15,519.8	2.10%	6,203,305	391,211	128,459 美元		0.797 美元
全部的				331,144,555	1,476,457			8.625 美元

*死亡率为每十万人。

资料来源:传统基金会计算。

SR286 A遗产.org

从未发生过。加上 2022 年家庭收入中位数 74,580 美元,精神健康成本约为 1.096 万亿美元 (4900 万例病例乘以每年 7,458 美元的治疗费用乘以三年)。

教育。GDP 衡量的是经济在各个时期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未在市场定价的服务 (如公共教育) 按其成本计入 GDP。

疫情期间,许多学校转为远程教学以满足社交距离要求。教师继续工作,因此他们对 GDP 的贡献没有变化。

然而,事实证明,远程学习的效果远不及传统的课堂学习。疫情期间,学生的标准化考试成绩有所下降,至今仍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2022 年全国教育进步评估中四年级和八年级学生的平均数学成绩分别比 2019 年低 5 分和 8 分。40 平均阅读成绩全面下降了 3 分。

这些教育损失意味着学生在学年中落后四分之一到四分之三的时间。41 使用年

考虑到公立中小学支出 8700 亿美元,这相当于教育损失 2180 亿美元至 6530 亿美元。

对于我们的损失计算,我们将取高端和低端数字的平均值,即 4350 亿美元。

结论

新冠肺炎疫情给美国带来了惊人的损失,无论是在人员伤亡还是经济方面。估计总损失达 18.007 万亿美元,这清楚地提醒我们这场全球卫生危机对美国造成的深远影响。通过了解和承认这些损失,我们可以为追究那些因疏忽或公开行动加剧疫情严重程度的人的责任奠定基础。

中国政府问责案例

委员会重点从两个方面评估中国共产党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扮演的角色。第一,审查有关中国科学和运营环境的现有事实和证据。第二,审查中国当局为掩盖真相而采取的行动。

科学与运营环境

经过仔细审查现有证据,本委员会认为,COVID-19 疫情很可能源于中国武汉的一次研究相关事故。中国政府隐瞒了大部分相关记录,并阻碍了所有可信的国际调查病毒来源的努力,但现有证据强烈支持这是一起与研究相关的事故。

尽管从理论上讲,COVID-19 仍有可能通过野生动物传染病⁴²或海鲜市场的溢出⁴³ (溢出是指病毒在传播给人类之前先在动物中传播)出现,但尽管进行了四年的广泛测试,这两种假设都没有证据基础。这些假设的支持者专注于早期病例的空间分析、从海鲜市场出现的两种谱系的指控以及易感动物的存在。这些假设面临着许多重大挑战。Worobey 等人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⁴⁴断言海鲜市场起源的确凿证据,后来被两位不同作者的同行评议文章驳斥,这些文章从统计上推翻了 Worobey 等人的空间分析。⁴⁵最终于 2024 年发布的早期病例数据完全驳斥了双重溢出论,并表明病毒一次传播给人类导致了大流行。⁴⁶从未发现海鲜市场有受感染动物的证据。⁴⁷

在其他病毒爆发中,此类证据很快就被发现,并且出现在这些动物通常的分销渠道和最终目的地的多个地方。⁴⁸

其他研究发现,在市场上发现的传播证据并未区分人与人之间的超级传播事件和自然溢出。⁴⁹基因和早期病例数据似乎表明,在与市场相关的疫情爆发之前,该病毒已在人类中传播。⁵⁰ 尽管从概念上讲,SARS-CoV-2 病毒可能是通过人类与野生动物的接触自然出现的,⁵¹ 但仍然没有证据表明该病毒直接通过蝙蝠或中间物种进行人畜共患传播。

逻辑与常识。导致 COVID-19 大流行的病毒,正式名称为 SARS-CoV-2,于2019 年秋季首次出现在中国武汉。这个拥有 1100 万人口的城市距离可能携带病毒的马蹄蝠的自然栖息地约一千英里⁵²,距离通常与病毒溢出有关的中国南部热带地区也很远。此外,武汉位于中国一个吃野生动物的人相对较少的地区,野生动物贸易也比中国其他一些地区少。

尽管武汉远离相关马蹄蝠的自然栖息地,也远离与 2003 年 SARS 疫情有关的动物分布渠道,⁵³但它却不知何故成为了该病毒出现的唯一城市,而其他任何地方均未发现独立的传入病例。

与此同时,武汉是中国病毒学研究的领先中心,拥有多个病毒学和公共卫生机构,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 (WIV)。⁵⁴武汉病毒研究所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捕获 SARS 样冠状病毒库,并在不合标准的安全条件下对这些病毒进行危险的研究。⁵⁵这项研究包括使用这些新制造的病毒感染动物,包括人源化小鼠。⁵⁶

尽管武汉病毒研究所自称是一家民事机构,⁵⁷但美国政府在 2021 年初表示,武汉病毒研究所与中国军方在出版物和秘密项目上进行了合作,包括实验室动物实验和冠状病毒实验。⁵⁸

中国以外的人很难对该研究所正在进行的实验有深入的了解,但我们知道,在2003 年 SARS 爆发后,武汉病毒研究所成为国际冠状病毒研究的焦点。⁵⁹武汉病毒研究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石正丽和她的同事们通过基因工程改造了嵌合型 SARS 样冠状病毒,与从自然界收集的病毒相比,这种冠状病毒在人源化小鼠中有时更具毒性。⁶⁰

石正丽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其他人在生物安全等级 2 (BSL - 2) 下开展了此类工作,⁶¹这比石正丽的前美国合作者、病毒学家拉尔夫·巴里克 (Ralph Baric) 使用的生物安全等级低得多,后者在 BSL-3 下开展了工作。⁶²BSL-2 严重不足以进行有风险的病毒实验。国际科学家的共识是,此类研究至少应在 BSL-3 下进行,理想情况下应在 BSL-4 下进行。

此外,SARS-CoV-2 病毒具有独特的特征和属性,表明其起源与研究有关。在所有这些特征中,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可能最受关注。

弗林蛋白酶切位点在这种被称为 sarbecoviruses 的冠状病毒亚属中从未见过。⁶³ 研究发现,弗林蛋白酶切位点是 SARS-CoV-2 发病机制的关键。⁶⁴ 有充分的理由证明,这种大流行病毒源自武汉的一项研究,当时科学家提议将弗林蛋白酶切位点插入新型 SARS 样冠状病毒中。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生物安全记录不足。疫情爆发前,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安全规程不足的情况由来已久,且屡见不鲜,这一点不容忽视。

例如,2017 年和 2018 年,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官员向国务院发送电报,警告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安全问题。这些电报被置之不理。这些电报很有先见之明,特别指出了该实验室在研究类似 SARS 的蝙蝠冠状病毒和人类感染性方面的工作的敏感性。⁶⁵

在美国政府另一次访问武汉期间,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一名官员了解到,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操作高防护等级 BSL-4 实验室的经验,必须“从零开始学习一切”。⁶⁶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博士。

高福于 2019 年 3 月在《生物安全与健康》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社论,警告潜在的自然、意外和故意的生物威胁。他特别指出了实验室风险:

不遵守已批准的生物防护和生物安全协议可能会导致病原体意外或故意释放到环境中……

病原体的基因改造可能会扩大宿主范围、增加传播力和毒力,从而带来新的流行病风险……

[例如]合成的蝙蝠来源的 SARS 样冠状病毒,其获得了增强的感染人类细胞的能力。⁶⁷

2019 年 7 月,武汉病毒研究所领导层警告称,他们正面临“紧急问题”。⁶⁸

尽管存在生物安全问题⁶⁹以及相关的松懈的安全规程,在该研究所的帮助下,危险病毒的研究继续快速发展。

美国国务院在 2021 年 1 月的一份情况说明中指出,它“有理由相信”武汉病毒研究所内的几名科学家“在 2019 年秋季患病”。⁷⁰ 据报道,这些科学家表现出与 COVID-19 或常见季节性疾病一致的症状,尽管武汉病毒研究所领导层声称那里的工作人员和学生中没有感染病例。⁷¹ 随后,美国新闻文章披露了有关三名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人员的更多信息,据报道,他们在武汉公开爆发 COVID-19 疫情之前就病倒了。⁷²

2018年DEFUSE提案与2019年SARS-CoV-2病毒相匹配。2021年,在线研究网络DRASTIC发布了与2018年3月向美国政府提交的一项名为DEFUSE的研究项目拨款提案相关的关键文件的详细信息,该项目旨在与后来被确定为SARS-CoV-2的基因图谱极为相似的方式操纵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冠状病毒。⁷³美国政府拒绝资助该提案,⁷⁴该提案原本是纽约组织生态健康联盟、武汉病毒研究所、新加坡杜克国立大学医学院和北卡罗来纳大学(UNC)的联合研究项目。美国知情权组织的研究人员于2023年12月获得的其他文件显示,DEFUSE提案的早期草案如何加强了其与SARS-CoV-2的相关性。⁷⁵

值得注意的是,北卡罗来纳大学研究员拉尔夫·巴里克(Ralph Baric)在DEFUSE提案的早期草案中向生态健康联盟负责人彼得·达斯扎克(Peter Daszak)评论道:“在中国,这些病毒可能在BSL2下生长。如果美国研究人员知道这件事,他们可能会惊慌失措。”⁷⁶

令人怀疑的是,2020年2月,在COVID-19爆发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科学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该病毒的论文,却遗漏了该病毒最重要、最新颖的特征:弗林蛋白酶切位点,⁷⁷该位点使病毒能够更有效地结合人体细胞并将其遗传物质释放到人体细胞中,从而使其易于传播且具有危险性。⁷⁸这尤其令人费解,因为鉴于石正丽参与了DEFUSE资助提案和之前的出版物,她本应熟悉弗林蛋白酶切位点。⁷⁹

尽管美国政府没有批准DEFUSE计划,但研究人员为已经开始的工作寻求资金支持是常见做法。武汉病毒研究所不需要依赖美国政府的资金支持来独立开展这项危险的研究。

如果没有经验丰富的外国机构的参与,中国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在BSL-2级别)开展业务,并且风险管理约束有限。⁸⁰

中国共产党的系统性掩盖

改变世界的七周。从2019年12月开始,中国官员有七周的时间可以表现出诚意并履行其国际承诺,以防止国内疫情演变为全球大流行。但他们始终选择不这样做。关键事实:

中国官员在 2019 年 12 月就知道,存在人与人之间的
新型病毒的人际传播。

中国当局极力压制医务人员、记者和其他中国公民的言论,有时甚至监禁他们,因为他们试图相互警告并
向世界警示病毒的严重性。

中国当局从 2019 年 12 月 27 日起隐瞒了 SARS-CoV-2 (病毒)的基因组序列。

中国当局向世界卫生组织 (WHO)隐瞒了重要信息,包括该疾病的病毒类型、真实的感染人数以及已证实
的人际传播情况,直到全世界都意识到他们无法控制疫情。

中国当局下令实验室销毁可能证明其有罪的证据。

中国当局向学术研究人员和科学家发出封口令,禁止他们分享有关该病毒的信息。

直到2020年1月11日,一名中国科学家无视官方命令,将基因组序列发布到网上,该
基因组序列才得以公开。
这种延误使得其他国家失去了立即开始研发检测、药物和疫苗的机会。

尽管有证据表明这种致命病毒可能无症状,但中国官员仍允许从武汉和其他中国城市起飞的国际航班继
续飞行。这促进了病毒在全球的传播。

中国官员阻止国际社会调查
疫情的起源。

2019 年 12 月。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SARS-CoV-2 于 2019 年秋季开始在武汉
传播。⁸¹中国多家医院的一线临床医生很快意识到“他们正在治疗的这种不寻常的
肺炎很可能具有传染性”。⁸²医院医生张莉后来写道,到 12 月底,“

” 2021 年 3 月 21 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接受采访时承认,虽然“武汉的医生向当地医院报告了早期病例,但这些病例并没有进入我们的(国家疾病报告)网络。”⁸⁴

事实上,在 2019 年 12 月确认疫情爆发的几个月前,武汉病毒研究所就改变了安全协议,订购了昂贵的新型空气焚烧炉⁸⁵和通风系统,并且 在半夜

神秘地关闭了包含 22,000 个蝙蝠病毒样本的在线数据库。⁸⁶

大量报道表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 2019 年秋季被感染。⁸⁷根据 2021 年的一份美国情报报告,该病毒最迟于 2019 年 11 月在武汉首次传播。⁸⁸其他数据显示,2019 年早些时候就出现了病例。⁸⁹然而,中国官方报告称,武汉第一例患者是在 2019 年 12 月 1 日记录的。⁹⁰

后来,他们把日期改为 12 月 8 日。⁹¹根据《南华早报》2020 年 3 月获得的中国政府文件,确诊了 9 例 2019 年 11 月发生的病例,最早的病例发生在 17 年 11 月 17 日。⁹²

在疫情暴发的关键初期,中国政府使用了强大的手段来控制 and 操纵有关病毒的信息。⁹³

从 2019 年 12 月 1 日开始,中国社交媒体上“非典”和“呼吸困难”等术语的使用开始增多,到 12 月 29 日达到顶峰。⁹⁴一天后,武汉地方当局向医疗机构发出“紧急通知”,禁止它们发布有关该疾病的“未经授权”的信息。⁹⁵这项禁令很快因社交媒体而失效。地方当局“关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类冠状病毒”的紧急通知迅速在社交媒体上流传。⁹⁶医务人员甚至因在中国否认人际传播时戴口罩而受到批评,导致不必要的死亡和进一步的传播。⁹⁷

最先尝试分享病毒信息的医生被警方拘留,并被迫承认“散布谣言”。⁹⁸中国记者和活动人士也因试图向同胞和外界讲述武汉内部发生的事情而被监禁。⁹⁹中国公民讲述的故事与中共官方的叙述截然不同。¹⁰⁰

中共隐瞒信息、发布虚假数据¹⁰¹并拒绝分享有关医护人员的信息 而这些信息是了解传播模式和制定疫情控制策略的关键。¹⁰²

12 月 24 日,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医生从一名肺炎患者肺部采集了液体样本,并将其发送给 Vision

一家中国基因组学公司 Medicals 进行检测。¹⁰³大约在那个时候,当地医生将来自武汉周边医院的至少 8 个其他患者样本发送给了多家中国基因组学公司,其中包括华大基因集团。¹⁰⁴

武汉两家医院的中国医务人员疑似感染病毒性肺炎,于 12 月 25 日被隔离¹⁰⁵,这为病毒人际传播提供了更多证据。¹⁰⁶

12月27日,微创医疗通过电话向医院和中国疾控中心报告了近乎完整的基因组序列的分析结果。

该序列还与解放军有联系的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共享,¹⁰⁷以便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这是一种源自蝙蝠的 SARS 样冠状病毒,同源性非常高。¹⁰⁸华大基因于 12 月 29 日完成了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组测序。¹⁰⁹实验室检测结果均指向 SARS 样病毒。

12 月 27 日,在微创医疗¹¹⁰对病毒进行测序并由华大基因¹¹¹跟进后,北京方面意识到了该病毒的严重性。

与此同时,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下令商业实验室销毁或交出病毒样本,并下令研究结果只有在获得官方批准后才能发表。¹¹²卫生健康委员会有关部门被派去扣押微创医疗公司的样本。

12 月 27 日晚 10 点左右,武汉市肺部感染定点医院院长金银潭与武汉病毒研究所核对了 SARS-CoV-2 序列,证实其与 SARS 同源,可能具有危险性。¹¹³

12 月 30 日,李文亮医生在一个在线聊天群中向其他医生发出了警告,并公布了初步证据。他警告说,武汉地方当局以“散布谣言”和“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对他们进行了封口和惩罚。¹¹⁴当地警方对举报人采取了羞辱手段。¹¹⁵

镇压行动全面展开,持续了数月。全国各地的警察威胁活动人士和律师。其他人则被判入狱¹¹⁶

或消失,¹¹⁷冒着生命危险讲出真相。¹¹⁸

12 月 30 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确认¹¹⁹存在不明原因的病毒,并下令医院、诊所和其他医疗机构严格禁止发布有关这种新疾病治疗的任何信息。¹²⁰截至 12 月 30 日,所有 27 名已知病例均被转至金银潭医院的负压肺部感染病房,使用每次转运后都消毒过的负压救护车。这些预防措施是医院在 12 月 27 日收到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指导后采取的。¹²¹

12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看到了武汉市卫生委员会网站的一份媒体声明,该声明称武汉出现“病毒性肺炎”病例。¹²²

2020年1月。2020年1月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命令武汉病毒研究所不得披露有关该疫情的任何信息,例如检测、实验数据和结果,即使是向合作组织和技术服务公司也不行。¹²³此外,还要求测序公司停止测序、销毁样本,不得传达任何信息。¹²⁴

2020年1月3日,中国官员向世卫组织提供了武汉发现的“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病例群的信息。¹²⁵中国当局告诉世卫组织,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¹²⁶同一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向实验室发送了一份秘密备忘录,禁止未经授权的科学家研究该病毒,并向公众披露信息。¹²⁷

中国当局禁止分享有关一线医护人员感染的关键数据。这些当局还反复强调,没有医护人员感染这种新病毒。这是可能人传人的重要迹象,用来表明该病毒传染性不强。¹²⁸

中共直到2020年1月20日才披露病毒可以人传人,无症状传播是新冠肺炎疫情控制的绊脚石。

据估计,无症状个体传播约占所有传播的60%。¹²⁹

延迟公布病毒序列/基因组并承认存在人际传播。1月11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张永珍团队在美国网站Virological.org上公布了病毒基因组序列。

130 (两天后,中国当局强
制关闭他的实验室进行“整顿”。¹³¹) 《华尔街日报》爆料中国科学家发现了一种新型冠状病毒。¹³²
直到张锋公布基因组后,中国政府、中国疾控中心、武汉病毒研究所和中国医学科学院才竞相公布他们的序列。¹³³这距离北京得到通知已经整整两周了。¹³⁴

基因组发布的延迟阻碍了对其在其他国家传播的认识。缺乏详细的患者数据也使得确定病毒传播速度更加困难,从而破坏了阻止或减缓其传播的努力。¹³⁵

到1月10日,医院病例数量开始激增。
当天,武汉一家医院的放射科医生诊断了30例病例。

1 月 15 日,另一家医院的一名放射科医生通过 CT 扫描诊断出 50 例病例,这比中国当局报告的疫情爆发以来的官方病例总数 (41 例)还要多。到 1 月 20 日, CT 扫描仪因负荷过重而出现故障。¹³⁶

尽管病例激增,湖北省省长于 1 月 17 日告诉官员,“政治永远是第一位的”,并引用了习近平自上而下的服从命令。¹³⁷此后不久,武汉市政府又举办了一场大型聚餐,有 4 万个家庭参加,¹³⁸这无疑成为了一场大规模的超级传播活动,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

最后,1 月 20 日,一位知名医生出现在中国国家电视台上,向公众告知了病毒人际传播的现实,并指出有 14 名医务人员感染。¹³⁹

显然,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至 2020 年 1 月初,北京的中国当局“已经获得了大量类似 SARS 的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组序列和全基因组,此外还有聚集性病例、疑似病例和专家医生对病毒病原体具有传染性的担忧”。¹⁴⁰从疾病预防和控制的角度来看,2019 年 12 月底中国政策制定者掌握的高质量信息量是巨大的。¹⁴¹

不受限制的旅行。中国政府同样迟迟没有限制空中交通。据中共新闻媒体《环球时报》报道,习近平于 1 月 22 日下令在武汉和湖北省其他城市“实施交通管制和人员流动”。¹⁴²第二天开始封锁。

但为时已晚。到 1 月 23 日,习近平错过了阻止病毒传播到全球的最后机会。今年 1 月,已有 700 万人离开武汉过春节,而通过从武汉出发的旅行,疫情已蔓延至 26 个国家的 30 多个城市。¹⁴³

习近平的指示暂停了从武汉飞往其他中国城市的航班,但允许从武汉起飞的国际航班继续飞行。¹⁴⁴目前已有 21 个国家开通了从武汉起飞的直飞航班。¹⁴⁵

尽管北京方面知道病毒具有致死率,并且能够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促使病毒在境外悄然传播。

1月31日美国政府限制旅行前,武汉直飞美国17个城市的航班有1300架次。¹⁴⁶

其他重要事实。北京隐瞒和审查有关该病毒的关键信息不仅影响中国本国人口或前往中国的旅行者,还影响全球科学界。WIV病毒数据库及其超过 22,000 个样本于 2019 年被关闭。

2019年9月。这个数据库本来对追踪 SARS-CoV-2 的来源最有用,但却从未向美国研究人员开放过。¹⁴⁷

2020年2月3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表讲话,阐述了他在1月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对疫情的指示和要求。习近平说:“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决服从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令行禁止,令行禁止。”¹⁴⁸因此,习近平早在1月7日就对病毒爆发作出了重要指示,尽管此后他一直坚持向中国公众和其他世界领导人掩盖和淡化此事。

中共囤积个人防护装备(PPE)。在疫情爆发初期,北京指示位于中国和海外的中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采购数百万个防护口罩、医用防护服和手套,并将它们运回大陆。中国当局将通用汽车和3M等外国公司的供应链和制造能力国有化,以生产医疗用品,同时拒绝向其产品发放出口许可证。¹⁴⁹

在美国获得病毒基因组之前,中国共产党显然已经在疫苗研发方面取得了进展。
151

解放军高级研究员、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第五研究所所长周玉森将军在疫情之前曾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工作,可能还在该所工作过。¹⁵²周玉森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冠状病毒疫苗学家。¹⁵³2020年2月24日,他提交了首批COVID-19疫苗专利之一,该专利要求同时获取SARS-CoV-2的序列和活病毒本身。¹⁵⁴与专利相关的研究方法表明,疫苗研发工作可能不迟于2019年11月开始。¹⁵⁵据报道,周玉森在2020年5月初提交了将SARS-CoV-2适应BALB/c小鼠的研究预印本和对其候选疫苗的初步测试,并于2020年7月发表该疫苗后不久神秘死亡。中国政府没有官方承认他的死讯。¹⁵⁶

中国是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卫生条例》(IHR)的缔约国,该条例在2002年至2004年SARS疫情后于2005年进行了修订。¹⁵⁷根据《国际卫生条例》,中国有责任收集有关COVID-19传播的数据并向世卫组织通报。¹⁵⁸中国违反了第6条和第7条。第6条要求各国首先向世卫组织通报以下事件:

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并提供任何及时、准确和详细的公共卫生信息。第七条将这一规定扩展至以下情况:一国发现其领土内发生意外或不寻常的公共卫生事件,即使其起源或来源不明,也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¹⁵⁹在 COVID-19 疫情中,中国的行为明显违反了这两条。

中国的不透明和胁迫不仅限于其国内决策和世卫组织义务。中国与澳大利亚的争端只是中共对外国政府实施胁迫的一个例子。在澳大利亚时任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呼吁对 COVID-19 的起源进行国际调查后,中国采取了报复措施,实施了包括对澳大利亚出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在内的贸易制裁。¹⁶⁰

其他国际上调查疫情起源的尝试也同样遭到中国官员的阻挠。¹⁶¹

2020 年 3 月,美国联邦调查局警告称,中国政府附属网络行为者和非传统数据收集者“被发现试图从与 COVID-19 相关的网络和人员那里识别并非法获取与疫苗、治疗和测试相关的宝贵知识产权 (IP) 和公共卫生数据

相关研究。”¹⁶²联邦调查局补充道:“这些信息可能被盗,危及安全、有效和高效的治疗方案的提供。”¹⁶³

结论

武汉医生、新冠肺炎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于 2020 年 2 月 7 日去世,享年 33 岁,留下了怀孕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他在去世前的一次采访中说:“如果官员早点披露疫情信息,我想情况会好得多。应该更加公开透明。”¹⁶⁴

尽管中国政府有义务向其他国家通报此次卫生危机,但其行为却不透明。中国政府一再采取措施,导致病毒传播,尽管它有义务向其他国家通报此次卫生危机。这种疏忽行为包括阻止分享相关科学数据、故意向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谎报人际传播、允许国际航班从受影响城市起飞等。这些行为也使确定病毒来源变得更加困难,让人更加怀疑该政权关于病毒来源的说法。

正如一位学者所观察到的：“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是专注于维持稳定,并迅速压制不受欢迎的意见和信号,这不适合处理从一开始就需要公众参与的疫情。”¹⁶⁵

中国的法律责任

本委员会认为,中国政府及其附属机构可以且应该为中国在 COVID-19 疫情中的疏忽和失职行为给美国及其人民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任何要求中国或其控制的企业实体对 COVID-19 病毒造成的破坏负责的行动都必须面对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FSIA)带来的巨大障碍,该法规定,除某些例外情况外,外国及其机构和代理人“应免受美国和各州法院的管辖”。¹⁶⁶

委员会发现,可以提出一系列潜在的诉讼理由(以及随之而来的事实调查领域),以要求中国根据《外国主权豁免法》对其在 COVID-19 疫情中的作用承担责任。

个案的成功取决于能否形成和整理克服外国主权豁免豁免权所必需的关键事实。尽管委员会再次认为,中国可以在外国主权豁免权的严格范围内承担责任,但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因此,委员会认为,应以狭义、有针对性和适当的方式修订外国主权豁免权,以便在全球流行病的特殊和独特背景下直接追究责任。

根据《外国主权豁免法》可能提起诉讼的原因

A. FSIA 的范围。

1. “外国”的定义包括国家本身及其“政治分支机构”(主要履行治理职能的机构)。¹⁶⁷

它还包括国家的“机构或工具”,它们是独立的法人或实体,要么是外国的“机关”,要么“其大部分股份或其他所有权利益由外国拥有”。¹⁶⁸ 这里涉及 FSIA 广泛豁免权的四个例外。

a. 首先,根据“商业活动例外”,外国不具有免疫力,因为:

-外国在美国开展的商业活动;

-在美国境内实施的与外国在其他地方的商业活动有关的行为;或

-在美国领土之外实施的与外国在其他地方的商业活动有关的行为,并且该行为在美国造成直接影响。¹⁶⁹

“当外国政府不是以市场监管者的身份行事,而是以市场中私人参与者的身份行事时”,该活动即为“商业”活动。¹⁷⁰ “如果效果是被告活动的直接后果,则该效果即为直接效果。”¹⁷¹

- b.第二,对于“在美国境内发生的、由该外国政府或其官员或雇员在履行职责或工作职责时实施的侵权行为或不作为造成的人身伤害或死亡,或财产损失或损失”,不享有豁免权。¹⁷²此处相关的是,“整个侵权行为”必须发生在美国境内。¹⁷³

但此项例外情况有一个例外,即有关行为“基于行使或履行或未能行使或履行自由裁量权,而不管该自由裁量权是否被滥用”或相关索赔“源于恶意起诉、滥用程序、诽谤、中伤、虚假陈述、欺骗或干涉合同权利”。¹⁷⁴按照《外国主权豁免法》的说法,“自由裁量行为”是一种蓄意的政策判断。¹⁷⁵

- c.第三,“国际恐怖主义行为”没有豁免权在美国。”¹⁷⁶《外国主权豁免法》引入了国际恐怖主义的刑法定义。¹⁷⁷

- d.最后,一个外国(或其组成部分)可以放弃其FSIA豁免权。¹⁷⁸

2.即使克服了FSIA的豁免权,FSIA也会带来四个额外的任何诉讼原因的复杂化。

- a.首先,《外国主权豁免法》为诉讼文书送达提供了具体的方案,以确保个人管辖权。¹⁷⁹中国政府在这些法律下非常善于使诉讼文书送达复杂化。

程序。送达程序不太可能构成不可逾越的障碍,但很可能需要国务院的合作和法庭上的动议实践。

b.即使《外国主权豁免法》不提供豁免,也绝对排除了惩罚性赔偿的追偿。¹⁸⁰它也几乎肯定排除了多种形式的禁令救济。

c.《外国主权豁免法》赋予联邦地区法院对任何涉及“外国”的诉讼。¹⁸¹任何州法院的诉讼均可据此撤销。¹⁸²此类诉讼应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进行审理。¹⁸³

d.独立于责任之外,外国主权豁免法限制了判决的执行。一般规则是“美国境内的财产”不受“扣押、逮捕和执行”的约束。¹⁸⁴例外情况是“财产用于或曾用于索赔所依据的商业活动”。¹⁸⁵更广泛的例外情况是“外国机构或部门在美国从事商业活动的美国境内财产”,前提是“判决涉及的索赔不属于该机构或部门根据第 1605(a)(2) 节或 (5) 节享有豁免权的索赔,无论该财产是否涉及或曾涉及索赔所依据的行为”。¹⁸⁶

B. 潜在当事人。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主权豁免法》并未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免于因 COVID-19 病毒传播而产生的索赔和指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和不作为导致 COVID-19 病毒在全球传播,这些行为和不作为具有侵权性、商业性和非自由裁量性,并在美国境内造成了直接伤害、财产损失和死亡。基于此类行为的索赔属于《美国法典》第 28 卷第 1605(a)(2) 和第 1605(a)(5) 条规定的主权豁免的公认例外情况。

附加被告必须符合《外国主权豁免法》的适用例外规定,即主要在美国直接开展与可诉行为相关的商业活动。委员会认为,两家中国航空公司符合附加被告的条件,根据《外国主权豁免法》,它们无权获得豁免。

2.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南航”）是一家

在美国开展业务的公司,因此受美国司法管辖。中国南方航空注册成立并设于广州,是一家国有企业,中国政府持有其多数股权。中国南方航空直接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其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澄清说,“中国政府在公司中的利益……可能与股东的利益相冲突”。¹⁸⁷中国南方航空的航线遍布全球,有 224 个目的地¹⁸⁸,包括美国洛杉矶、纽约和旧金山。通过中国南方航空,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一项传统的商业活动,即拥有和运营一家民用航空公司,向全球的货运和旅客开放,包括往返美国的旅客。作为其运营飞往美国航班权利的条件,中国南方航空放弃了其主权豁免权。¹⁸⁹

3.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航空”是一家在美国开展业务的公司,因此受美国司法管辖。中国东方航空注册成立并设于上海,是一家国有企业,中国持有其多数股权。该航空公司的网站将其列为“中国三家国有骨干航空公司之一”。¹⁹⁰中国东方航空运营国际航线,目的地包括芝加哥、洛杉矶、纽约和旧金山。通过中国东方航空,中国从事一项传统的商业活动,即拥有和运营一家民用航空公司,向全球的货运和旅客开放,包括往返美国的旅客。

作为其运营飞往美国航班权利的条件,中国东方航空放弃了其主权豁免。¹⁹¹

还应考虑中国医药集团（Sinopharm）、中国PPE 设备制造商和其他可能的被告。

C. 先前成功的 COVID 病例。

据我们所知,唯一幸存下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索赔
FSIA 豁免权涉及中国在囤积 PPE 物资方面的作用,

根据第三种商业行为例外理论（在美国领土之外实施的行为,与外国在其他地方的商业活动有关,并在美国造成直接影响）。

第一个案例是密苏里州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案。¹⁹²

在该案中,密苏里州起诉中国国家税务总局,指控其滋扰公众、从事异常危险活动、允许新冠病毒传播而违反职责以及囤积个人防护装备而违反职责。尽管地方法院以《外国主权豁免法》下缺乏管辖权为由驳回了该案,但第八巡回上诉法院裁定,根据《外国主权豁免法》,每个被告都是“外国”,《外国主权豁免法》适用于前三项索赔,但推翻了地方法院驳回密苏里州囤积索赔的判决,裁定《外国主权豁免法》的商业活动第三项例外适用于囤积个人防护装备的索赔。第八巡回上诉法院将该案发回地方法院,以便根据该意见进行进一步审理,让密苏里州有机会试图证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囤积了个人防护装备,他们的反竞争行为本质上是商业性的,并且他们的行为对美国产生了直接影响。

同样,密西西比州于 2020 年在联邦地区法院对 PRC 提起两项诉讼,声称 PRC 既违反了《密西西比州消费者保护法》,掩盖了 COVID-19 的严重性和囤积 PPE,又违反了该州的反垄断法,“限制或试图限制与 PPE 有关的贸易自由”。¹⁹³

2024 年 3 月 5 日,法院书记员对被告作出缺席判决。诉讼的下一步是损害赔偿听证会。¹⁹⁴

D. 具体的可能诉讼原因。

1. 疏忽。可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索赔,或类似索赔

在美国开展业务的商业实体,如中国南方航空和中国东方航空,因传统的普通法过失而遭起诉。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方针和其他客观标准,这些被告负有非自由裁量义务,合理地向公众通报即将发生的灾难,并合理地维护安全协议。中国违反了其义务,未能在进行有风险的病毒研究中保持应有的谨慎,从 2019 年 12 月开始疏忽地歪曲有关病毒的事实,允许来自中国境内已知有 COVID-19 感染地区的个人出国旅行,以及为营利而运送

在没有充分警告的情况下,将感染者通过南航和东航转运至美国,从而导致新冠病毒传播。被告的行为直接导致

其商业活动导致数百万美国人遭受人身和财产损失。

2.对异常危险活动承担严格责任。可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直接相关被告（如武汉病毒研究所）提起这项索赔，指控其对异常危险活动承担责任。任何人“从事异常危险活动，即使已尽最大努力防止损害，仍需对活动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195近期有关武汉病毒研究所和中国实验室的冠状病毒研究和生物安全问题的证据更清楚地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了异常危险的活动。这些活动不是主权行为，而是市场行为者的行为，它们在经济上支持科学实验中的危险商业风险。开展此类研究并非主权行为；这是大学、制药公司和私人实验室等其他行为者可以开展的商业活动。

3.公共妨害。根据普通法公共妨害索赔，可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和其他在美国有直接运营的实体提出该索赔。围绕 COVID-19 的简单事实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承担任

此次疫情背后的病毒出现在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所在的城市，该研究所是研究 SARS 类病毒的实验室。疫情爆发一年前，该实验室的科学家就提出制造与 SARS-CoV-2 具有相似关键特征的病毒。

该实验室的生物安全条件不足，不适合控制 SARS-CoV-2 等病毒。现有证据并不支持病毒起源于更自然的理论，例如病毒来自市场上的野生动物。196

当这种疾病开始感染人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非但没有限制其传播，反而试图掩盖其来源和严重程度。

与此同时，中国通过中国南方航空和中国东方航空继续开展海外商业航班，有效地将病毒输出到美国等国家。被告的行为和不作为“严重干扰了公众健康、公共安全、公共和平、公共舒适或公共便利”。197被告以以下方式集体运营商业航空公司：

明知故犯地或鲁莽地将一种致命、高度传染性的病毒运往美国。被告的行为直接造成了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不计其数的感染和非致命伤害,以及超过一百万美国人的死亡。

4.反竞争行为。根据联邦法律或州法律,可以针对 PRC 在囤积和销售个人防护设备方面的反竞争行为对 PRC 提出此项索赔。

可以肯定的是,国家通常不是反垄断被告,但这起案件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不是以国家的身份行事,而是以市场参与者的身份行事。从 2020 年 1 月 23 日到 1 月 3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收购全球很大一部分口罩供应,同时阻止个人防护设备出口到中国境外,尽管它努力购买全球大部分 PPE 供应。¹⁹⁸中国销往国外的少量 PPE 存在缺陷且不合格,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优质材料留给自己,同时以高价将有缺陷的设备卖给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控制了中国境内为包括 3M 在内的美国客户生产 PPE 的工厂,然后指挥它们的生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义务不囤积个人防护装备,也不向医疗服务提供者提供无效的个人防护装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个人防护装备市场的商业行为给个人防护装备市场的其他参与者(包括美国的医疗保健提供者)造成了经济损失,也给缺乏足够个人防护装备的人造成了人身伤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依靠反竞争行为让中国在应对 COVID-19 后果方面获得了不公平的优势,而且还从美国客户那里榨取了不劳而获的利润,而这些利润是由美国客户无法预见的需求膨胀而来的。而这些需求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的鲁莽行为造成的。同样,密苏里州根据这一理论提出的诉讼请求在根据《外国主权豁免法》提出的驳回动议中得以成立。¹⁹⁹

5.欺诈性虚假陈述。此索赔可针对

中国南方航空和中国东方航空就各自实体就 COVID-19 所发表的公开评论,根据普通法对欺诈性虚假陈述的侵权行为责任进行了调查。

公司就 COVID-19 发表的公开评论有权根据欺诈性虚假陈述的侵权索赔采取行动。“

以欺诈手段对事实、观点、意图或法律作出虚假陈述,以诱使他人依据该虚假陈述采取或不采取行动,则应向他人承担因合理依赖该虚假陈述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的责任。”²⁰⁰在中国普遍了解病毒的严重性之前,中国国有企业就已掌握了有关新冠病毒的真实程度和严重性及其对人口影响的信息,因此应承担 responsibility,因为他们的公开声明歪曲了病毒危险的严重性,特别是没有说明该病毒是一种新型病毒,情况在不断变化,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已经清楚地了解该病毒的规模和危险性。

6.根据美国法典第 18 章第 1961 条及以下条款,违反《反诈骗及腐败组织法》的民事行为。本案赔

可以对中国南方航空和中国东方航空提起民事诉讼,指控其违反《反诈骗和腐败组织法》(RICO)。从 2019 年 12 月到 2020 年 2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 COVID-19 向国际社会作出了一系列故意虚假陈述,包括病毒来源不明、中国研究人员尚未识别或测序该病毒、人际传播和无症状传播都不是该病毒的特征。航空公司被告重复了这些虚假陈述,并向乘客和外国监管机构欺诈性地隐瞒了传播 COVID-19 的危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航空公司被告共同实施了一系列欺诈和反竞争行为,助长了犯罪活动,违反了美国法典第 18 章第 1961 条及以下各节。潜在原告应收集所有可用的证据,证明虚假重要陈述被用于欺诈目的,例如招募商业旅客或在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被告的犯罪行为持续了数月,使他们能够垄断个人防护设备市场,并继续将感染者商业运输到国外(包括美国境内的许多地方)中获利。被告的欺诈性虚假陈述和反竞争行为是原告在 PPE 市场遭受经济损失的唯一直接原因(如果对原告而言),也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数百万人患病和死亡的直接原因。

E. 寻求救济。

为了获得初步救济,原告应寻求 Mareva 禁令/冻结令以避免资产流失。对于最终裁决,原告应寻求 (i)赔偿/归还;(ii)任何授权的民事处罚;(iii)实际、直接和/或间接损害;(iv)诉讼费用;和 (v)判决前利息。至于未来的禁令救济,法院能否下令实施此类救济值得怀疑。

《外国主权豁免法》的修订

委员会认为,正确理解《外国主权豁免法》不会阻止对中国及其机构提起诉讼。然而,为了清晰起见,委员会认为国会应该通过立法,在特定背景下取消外国主权豁免,例如全球流行病的特殊情况,这种流行病导致超过一百万美国公民和居民死亡,而这些死亡是由外国造成的。

这种方法是先例的。2016 年通过了《对恐怖主义支持者进行司法制裁法案》²⁰¹,以回应人们对《外国主权豁免法》过度限制美国人寻求 9·11 事件司法救济的强烈担忧。²⁰²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法案无视奥巴马总统的否决。²⁰³

有人考虑提出一项法案,直接针对中国过去的行为,取消其与新冠肺炎相关的豁免权。²⁰⁴这引发了关于是否符合主权豁免习惯国际法的复杂决策。它还引发了这样的考虑:任何废除《外国主权豁免法》的行动都会产生相当大的经济影响,因为这将使中国公司在美国开展业务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委员会提出了一条折衷方案:对于与新冠肺炎大流行同等规模、对美国产生巨大影响的世界性灾难,废除《外国主权豁免法》。拟议的措辞如下:

美国地区法院对因外国政府或其任何官员、雇员或代理人的鲁莽行为或不作为(包括有意无视及时报告信息的需要或故意隐瞒相关信息)在美国境内对个人、财产或企业造成身体或经济损失而向外国政府寻求金钱赔偿的任何案件具有初审和专属管辖权。

该外国代理人在其职务、工作或机构范围内行事,造成或严重加剧了美国的任何全球性流行病,无论该行为或不作为发生在何处;该外国未能进行或允许进行全面、不受约束的调查,但前提是,全球流行病的生物因子是导致美国超过 1,000,000 人因该流行病直接或间接死亡的病原体。

可以将此类条款作为对现有《外国主权豁免法》框架的修订。还需要考虑其他修订,以提供陪审团审判、惩罚性赔偿、资产扣押和简化服务。(资产扣押的一个想法是利用《外国主权豁免法》中恐怖主义例外的先例,该先例允许任何赢得对恐怖主义国家赞助者的损害赔偿判决的美国人,对国家赞助者本身及其控制的任何国有企业的商业资产执行该判决。这个想法是在与中国政府支持的知识产权盗窃有关的《外国主权豁免法》修正案的背景下提出的,对于这项拟议的疫情豁免同样有价值。²⁰⁵

应考虑建立某种机制,使美国能够在国家利益需要时暂停对《外国主权豁免法》的任何例外。一种可能的方法是修改《迷人贝琪》的做法。²⁰⁶根据这种方法,如果司法部长和国务卿都亲自提交证明,证明该行动违反了美国利益,则《外国主权豁免法》的修改将不适用。可以提供一些因素供他们考虑,例如该州是否进行了全面和不受约束的调查,并公开了调查结果。

对联合国的政策建议 各国应要求中国对其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作用

有足够多的证据表明中国共产党在 COVID-19 疫情的破坏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美国领导层需要推动问责、赔偿和未来的全球公共卫生。不作为只会激励中共继续其不透明、不合作甚至敌对的行为。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和乔·拜登总统都承诺要追究中共的责任,国会议员也是如此,但尚未采取任何有意义的行动。现在是兑现这些承诺的时候了。

传统基金会中国与新冠肺炎无党派委员会考虑了多种行动方案,不仅权衡了在当前政治环境下推进行政行动或颁布立法的能力,还权衡了任何行动方案所固有的权衡。这些最终建议旨在通过建立强有力的威慑、透明度和问责机制来降低类似疫情爆发的可能性。

对国会的建议

1. 建立跨党派美国国家新冠肺炎委员会。

国会应该成立一个委员会,并通过预算补偿为其提供资金。人们曾努力成立一个像 9/11 委员会那样的委员会,但进展缓慢。2017 年美国传统基金会中国和 COVID-19 无党派委员会认为,在如此重大的事件发生后,成立这样一个小组势在必行。该委员会将具有多面性,其职责包括审查中国的疏忽和掩盖行为,以及评估 COVID-19 抵达美国后实施的国内政策。我们强烈鼓励其他国家成立自己的委员会,进行类似的审查,以追究中国的责任。

2. 成立一个跨党派的赔偿/补偿工作组,以处理针对中国的索赔。美国公民因新冠疫情而遭受的痛苦和折磨理

应得到中国的赔偿。从历史上看,已经建立了几个全球公认的模式来评估大规模索赔的责任并予以抵消

因政府的侵略或疏忽而造成的损害赔偿。这些范围从德国大屠杀索赔会议到涵盖伊拉克 1990 年入侵科威特的联合国赔偿委员会。如果国会提出的《中国政府 COVID-19 问责法案》得以颁布,它本可以用来确保中国赔偿。²⁰⁸该工作组可以与建议 1 中提出的国家 COVID-19 委员会合并,也可以单独设立一个实体。

3.为提起民事诉讼提供便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会必须探索扩大美国联邦法院管辖权的机会,以便允许中国个人或机构对美国民事诉讼承担责任。²⁰⁹

与 2023 年《中共错误死亡责任法案》²¹⁰ 中提出的方案类似,该法案将通过扣除欠中国的利息或债务,或从对中国的外国援助资金中扣除,向因 COVID-19 疫情而受到伤害的平民提供补偿。

尽管根据《外国主权豁免法》的现行文本,可能产生责任,但委员会建议国会通过并由总统签署以下修正案:

如果因某个外国或该外国的任何官员、雇员或代理人在其职务、受雇或代理范围内的行为的任何鲁莽行为或不作为(包括有意忽视及时报告信息的需要或者故意隐瞒相关信息)造成美国境内人员、财产或企业遭受身体或经济损失,并因此向该外国寻求金钱赔偿,而导致该损害,则无论该行为或不作为发生在何地,导致或严重加剧美国境内的任何全球性流行病;但前提是,导致全球性流行病的生物因子是造成美国超额死亡人数超过 1,000,000 人的直接或间接病原体。

4.通过《生物安全法案》,开始将美国政府和商业供应链与中国国有企业脱钩。该法案将限制美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承包商继续与中国企业开展业务

与中国共产党、国家和军队有联系的“令人关注的生物技术实体”。211该法案于今年年初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两党的支持下提出,目前仍在两院审议中。

最终,美国减少对中国等外国生产个人防护装备和药品等疫情相关需求的依赖,也将增强美国的韧性。美国韧性的增强反过来又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公共卫生利益。

5.通过立法对所有美国政府部门进行审计

对中国生物学及相关研究活动的资助,其结构遵循一项可反驳的推定,即除非相关资助者能够证明其研究项目完全符合公众利益并且造成危害的风险极低,否则此类研究将被停止。

目标是确保美国不资助在不受控制的环境中、在缺乏安全保障设备和协议的情况下进行的危险研究,也不资助可能被中国军方和安全部门武器化的研究。这一标准将适用于所有未来和现有的中国生物学及相关研究活动,这些研究活动由美国联邦拨款或接受联邦资助的教育和研究机构资助。这将包括任何通过联邦奖励直接资助或通过来自接受联邦资助并将工作分包给中国的组织的子奖励间接资助。对于所有现有研究,资助者将有一年的时间反驳其研究存在不可接受风险的假设。美国政府将成立一个由国家安全从业人员和专家以及科学和生物学从业人员和专家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审查在中国启动或继续生物学及相关研究的申请。至少一半的委员将是国家安全从业人员和专家。委员会成员将由行政部门、美国参议院和美国众议院任命的人员组成。(国会任命应由各自议院的多数党和少数党领导人任命。)未能反驳危害推定的研究项目将被暂停和/或拒绝。

由于中国研究人员继续在不达标或生物安全水平不足的研究实验室进行高度致命和高风险的研究,美国纳税人的钱不应该用来资助一个不遵守基础研究和透明度协议的国家的研究。鉴于中国所有科学活动都由一党专制统治,这些问题至少是政治和系统问题,也是技术和科学问题。

- 6.修改《化学和生物武器控制与消除战争法》,对未能维护其生物设施并隐瞒数据的实体实施两阶段制裁。这些实体,如武汉病毒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应因未能维持基本安全标准和共享相关数据而被追究责任。可以针对此类实体制定两阶段制裁制度。在确定发生生物或化学事件后,可以在一段时间内采取补救措施。

国会可以下令对该事件进行调查,并可以确定该事件是否由外国实体的严重或重大疏忽造成。212

- 7.与国家新兴生物技术安全委员会密切合作。该咨询委员会由国会设立,负责审查新兴生物技术和相关技术的进步将如何影响国防部的当前和未来活动,并将在2024年12月为国会和联邦政府的行动提供建议。我们预计这些建议将极为重要,并建议将我们的建议与他们的建议一并考虑。

对总统的建议

1.要求中国允许全面

需要对新冠病毒在中国的起源进行广泛、不受约束的科学和法医调查。国际专家需要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开展研究并分享结果。

时至今日,中国政府仍禁止对疫情的起源进行正式调查。2020年,美国、盟国和国际科学家多次呼吁中国

提供所有可用信息,以确定新型病毒的来源,从而确定其致死率和轨迹,并开始开发疫苗和治疗方法。2021 年,七国集团峰会的领导人呼吁进行一项透明的、由专家主导的 COVID-19 研究。这并没有发生。相反,中国阻碍了世卫组织新型病原体起源科学咨询小组 (SAGO) 的工作。中国继续混淆事实,并积极阻止对大流行起源进行任何有意义的调查,这不仅是对 COVID-19 受害者及其家人的侮辱;它们还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2.对与掩盖新冠病毒疫情有关的中国官员和实体实施经济制裁。213本着《李文亮全球公共卫生问责法案》和《2023 年冠状病毒来源验证、调查和确定法案》的精神, 214

美国政府应对以下人员实施制裁:(1)被认定直接参与歪曲和隐瞒与 COVID-19 疫情相关信息的中国高级官员;(2)协助和/或支持歪曲和隐瞒信息的个人。此外,国务卿和财政部长应调查对武汉病毒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及其广泛的政府、学术和商业附属机构网络的制裁,原因是这些机构参与了掩盖 COVID-19 疫情的活动,并为中国军方从事未申报的机密生物武器研发,这可能违反了美国总统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第 13382 号行政命令。215

3.认识到新冠肺炎疫情是划时代的事件,类似于核时代的到来,迫使美国法律、政策、外交、政府、商业和学术事务做出同样重大的改变。过去 10 到 15 年间才出现的功能增强技术

最致命的病毒可能与最具传染性的病毒融合在一起,这似乎对人类生命构成了物种层面的风险。对可能引发大流行的病原体而言,功能获得性风险在于一个地方的一个错误 更不用说某个国家或政府的蓄意行为了。

非国家行为体 就足够了。一旦具有足够传染性和致命性的病毒逃出实验室,人类可能就无能为力阻止它了。正如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迫使建立新的国内和国际规范、标准和机构一样, COVID-19 的例子足以证明公众对生物安全的巨大关注和政策创新是合理的,涉及从功能获得资金到实验室安全标准、国际透明度规范、技术控制等方方面面。然而,这样的创新却很少发生。

克服这一失败是国家领导层的基本义务。

- 4.根据 2023 年 8 月第 14105 号行政命令,将生物技术纳入美国对华投资的限制领域。216该命令应扩大到涵盖生物技术,国会应通过立法加强对美国政府和私营部门对包括生物技术在内的中国行业投资的限制。中国最近颁布了影响深远的政策变化,越来越多地在其国家安全框架内重新定义生物研究。2017 年,北京表示将为生物研究提供特别政府资金,作为该国“军民融合”运动的一部分 这是一项将民用技术和研究融入人民解放军用于军事用途的国家计划。217美国

美国能源部官员警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同行,基因编辑将带来国家安全风险,并可能被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敌对势力利用。218鉴于这一威胁,美国政府必须通过国会通过的任何新的对外投资制度或法律,密切审查美国在中国的生物技术投资。

5.责成美国情报界优先考虑

收集和分析有关 COVID-19 起源的数据,与包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五眼”伙伴一起开展工作。作为这一过程的一部分,在独立的科学和国家安全专家的协助下,进行积极的内部“经验教训”审查,以研究自 COVID-19 爆发以来与情报相关的缺陷以及生物安全和生物监测的总体情况。生物情报 (BIOINT)应成为美国情报界的核心学科,拥有高度多样化的来源和方法。

作为此过程的附加部分,全面(且延迟地)遵守 2023 年《COVID-19 起源法案》。该法律要求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解密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和 2019 年冠状病毒病(COVID-19)起源之间潜在联系有关的所有信息”,并向国会提交一份非机密报告,“其中只包含局长认为保护来源和方法所必需的删节”。²¹⁹

6. 大力加强早期发现和准备。美国在其 2024 年美国全球卫生安全战略中宣布了一项为下一次大流行做准备的五年计划。该计划旨在将美国的正式全球卫生安全合作伙伴从 19 个州扩大到 50 个州,并通过改进检测、监测、实验室能力和免疫接种来增强合作伙伴识别和应对疾病的能力。“全政府”战略致力于在地方、国家、地区和国际层面利用私营和公共部门来加强卫生和研究系统。²²⁰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还需要做更多。行政机构应提供预防未来大流行相关事件的全球协议,并明确解释不遵守这些协议的后果。

总统应推动以生物威胁检测为中心的公私伙伴关系。总统还应在值得信赖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帮助下,努力使这一网络全球化。

建立有效的预警系统来应对自然或人为的病原体和疫情,必须成为国防和国家安全的核心职能,而不仅仅是美国及其合作伙伴的公共卫生活动。²²¹生物监视和生物情报(BIOINT)能够而且必须能够在医院临床病例积累之前检测出可能引发大流行的病原体。它还必须利用情报来源和方法以及下一代基因组分析技术,开发一种可靠地辨别自然和人工增强病原体的方法,作为迈向威慑的关键第一步。美国必须获得一种类似于其核威胁来源归因能力的生物威胁来源归因能力。

7.建立新的科研与合作框架

并与盟友和伙伴一起建立集体复原力。

举行与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总统峰会,审查 COVID-19 的影响,并启动一项全面的集体复原力战略,以抵御未来的流行病和/或生物威胁。尽管中国一直是美国最大的研究伙伴,但中共的行动证明,美国现在应该在科学合作中更好地优先考虑安全和国家安全,包括优先与拥有共同研究诚信和安全价值观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开展研究。²²²

8.对中国违反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卫生条例》的行为作出重大赔偿。²²³中国违反了《国际卫生条例》第六条和第七条。

第六条要求各国首先向世卫组织通报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并提供其掌握的任何及时、准确和详细的公共卫生信息。第七条将这一规定扩展到以下情况:一国发现其境内发生意外或不寻常的公共卫生事件,即使其起源或来源不明,也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中国必须对其他 192 个国家负责,因为中国故意违反了其签署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如果允许中国无视其国际承诺,肆无忌惮地引发灾难性的全球大流行,那么任何全球大流行条约都不可能取得成功。

9.考虑暂停或撤销1979年科学技术

美国与中国签署了一项技术合作协议 (STA)。自 2023 年 8 月起,STA 一直处于临时的逐月延期状态。²²⁴虽然 STA 是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合作协议,但自 2018 年上次续签以来,情况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中国不仅继续阻止对 COVID-19 起源的任何可靠调查,而且大量咄咄逼人的中国新法律严重限制了美国科学家、学者和研究人员与中国同行合作的能力。中国的军民融合政策不区分技术的军用和民用,从而使中国能够继续开展国际科学合作,同时隐瞒这种合作也有助于中国军队的现代化。²²⁵

10. 核实中国遵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情况。《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第一条和第三条规定，必须防止开发、制造或获得“无理由用于预防、保护或其他和平目的”的任何生物制剂、毒素、武器或设备，并“不得转让或以其他方式协助、鼓励或诱导任何人制造或以其他方式获取生物武器。”²²⁶

尽管《生物武器公约》于 1975 年生效，并禁止了一整类武器，但该公约缺乏正式的核查协议和程序。1987 年，公约缔约国建立了年度数据交换机制，称为建立信任措施 (CBM)。中国于 1984 年成为《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自 1993 年以来，美国国务院一直对其遵守公约的情况提出质疑和担忧。中国自 1989 年以来每年都提交建立信任措施报告，最近一次是在 2023 年。然而，其建立信任措施报告从未披露中国曾拥有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中国也从未公开或在外交渠道承认其过去在进攻性生物武器方面的努力。然而，据报道，中国已将蓖麻毒素、肉毒杆菌毒素以及炭疽、霍乱、鼠疫和土拉菌病的细菌制剂武器化。²²⁷

中国军事医疗机构已开展研究，以识别、测试和表征具有双重用途（民用和军用）的各种强效毒素。中国年度 CBM 不包括军事机构开展的这种针对病原体和海洋及动物毒素的双重用途生物学研究的信息。²²⁸

结论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造成 2800 万人死亡，整个经济体崩溃，弱势群体陷入贫困。此外还引发了一场精神健康危机。整整一代人的教育经历被打乱。仅在美国，这场疫情就导致 100 多万人死亡，据我们估计，该国损失达 18 万亿美元。数百万成人和儿童仍在遭受长期新冠肺炎这种常常使人衰弱的疾病的折磨。

这场灾难的范围和规模要求我们了解这种致命病毒的起源及其传播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无党派中国与新冠肺炎问题委员会的调查发现,证据表明,该病毒源于武汉的一次研究相关事件。该报告进一步详细记录了中国在疫情爆发的最初几周和几个月里采取的行动。

事实是,中国政府的行动不负责任,也不透明。他们向本国公众、科学界和全世界隐瞒了有关 COVID-19 的重要信息,甚至包括疾病何时何地开始。中国政府销毁证据,积极封杀本国科学家,以提问为由监禁记者,并阻止国际社会调查 COVID-19 的起源。尽管中国政府签署了一项国际协议,要求其准确及时地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此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它却采取了这些和其他行动。

鉴于中国缺乏自我问责,并考虑到其在国际机构中扮演的阻挠角色,委员会认为,只有让中国政府为其疏忽和渎职行为承担责任,才能为中国政府和其他政府提供激励和动力,使其在未来采取不同的行动。美国政府有责任实施我们提出的建议。委员会还希望其他政府能从我们的工作中汲取灵感,并将其作为在本国情况下采用的典范。现在采取大胆行动比问自己为什么在未来出现更致命的疫情时没有做更多更好。

委员简历

约翰·拉特克利夫 (John Ratcliffe) 主席

约翰·拉特克利夫担任中国和新冠肺炎无党派委员会主席。此前,拉特克利夫曾担任美国第六任国家情报总监 (DNI),担任唐纳德·J·特朗普总统的首席情报顾问,也是美国情报界的高级官员。在任期间,拉特克利夫成功协调和部署情报和军事资产,将多名指定恐怖分子头目从战场上清除,并因此被授予国家安全奖章,这是美国在情报和国家安全领域杰出成就的最高荣誉。



在被提名并确认为国家情报总监之前,约翰·拉特克利夫曾任美国德克萨斯州第四国会选区的众议员五年多,并担任众议院情报、国土安全和司法委员会成员。

拉特克利夫局长还曾在小布什政府任职,最初被任命为德克萨斯州东区反恐主管,后来被司法任命为美国检察官,并于2007年至2008年担任该地区最高联邦执法官员。

2008年至2014年,拉特克利夫主任与前美国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共同创立了 Ashcroft Sutton Ratcliffe LLP,该公司为国家和国际安全问题提供战略法律咨询。目前,拉特克利夫主任担任多个董事会和顾问委员会成员,致力于改善美国的国家安全态势。

罗伯特·C·奥布莱恩

罗伯特·奥布莱恩 (Robert O. Brien) 是美国全球战略有限责任公司 (American Global Strategies LLC) 的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 曾于 2019 年至 2021 年担任第 27 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奥布莱恩担任总统的首席顾问, 负责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事务的各个方面, 并重新将重点放在国防和工业基础问题上。奥布莱恩长期倡导海上力量和拥有 355 艘舰艇的海军, 在任职期间访问了领先的造船厂。他还在国防工厂和世界各地的基地与我们的部队共度时光。



奥布莱恩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期间, 美国在中东促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亚伯拉罕协议》, 促成了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之间的经济正常化, 实现了北约盟国之间国防开支的大幅增加, 并加强了与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盟友的合作。

在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之前, 奥布莱恩曾担任总统人质事务特使, 个人级别为大使。他直接参与了 25 多名被拘留者和人质返回美国的事宜。

奥布莱恩曾在康多莉扎·赖斯和希拉里·克林顿两任国务卿领导下, 担任美国国务院阿富汗司法改革公共私人伙伴关系项目的联合主席。

奥布莱恩还于 2008 年至 2011 年期间被总统任命为美国文化财产咨询委员会成员。2005 年, 他被乔治·W·布什总统提名, 并得到美国参议院一致批准, 担任第 60 届联合国大会的美国众议员。在职业生涯早期, 奥布莱恩曾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委员会的高级法律官员, 该委员会负责决定第一次海湾战争后对伊拉克提出的索赔问题。他是美国陆军预备役军法署少校。

奥布莱恩是洛杉矶 Larson LLP 律师事务所的名誉合伙人, 该律师事务所是一家全国知名的诉讼律师事务所, 由他于 2016 年共同创立。在他的职业生涯中, 他曾在数十起国际诉讼中担任律师和仲裁员。

奥布莱恩曾获得国家 security 奖章、国家情报杰出服务奖章、国防部

杰出公共服务勋章、国防勋章、法国荣誉军团勋章（骑士勋章）、中华民国（台湾）特别大绶带光辉之星勋章和科索沃总统功绩勋章。

美国国家水面海军博物馆将奥布莱恩评为2021年海洋自由奖获得者。同年,奥布莱恩和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因在任期间为《亚伯拉罕协议》和其他倡议所做的工作而获得了理查德·尼克松基金会的“和平建筑师奖”。2020年《亚伯拉罕协议》签署后,以色列国在耶路撒冷山的约翰·肯尼迪纪念森林种植了一棵树,以纪念奥布莱恩。2019年,奥布莱恩获得了米里亚姆博士和谢尔登·阿德尔森美国和以色列防御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于2011年向奥布莱恩颁发了斯蒂芬·A·里森菲尔德纪念奖,以表彰其在国际法领域的杰出贡献。

2022年7月,奥布莱恩当选为理查德·尼克松基金会董事会主席,并与蓬佩奥国务卿共同担任尼克松保守现实主义与国家安全研讨会主席。

O'Brien 拥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的法学博士学位。他获得了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学士学位。

海蒂·海特坎普

玛丽·凯瑟琳·“海蒂”·海特坎普是中国和 COVID-19 无党派委员会成员。她于 2023 年 1 月成为芝加哥大学政治研究所所长。她是一名政治家,曾于 2013 年至 2019 年担任北达科他州美国参议员。



北达科他州

她是民主党无党派联盟党成员,也是北达科他州第一位当选美国参议员的女性。

海特坎普于 1992 年至 2000 年担任第 28 任北达科他州司法部长,并于 1986 年至 1992 年担任第 20 任北达科他州税务专员。截至 2022 年,她是最后一位在国会代表北达科他州的民主党人,也是最后一位担任州级公职的人。

离开参议院后,海特坎普成为 CNBC 撰稿人,并担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政治研究所客座研究员。2019年4月,她与印第安纳州参议员乔·唐纳利(2018年也未能连任)一起发起了“一个国家计划”,这是一个旨在帮助民主党重新与农村选民建立联系的组织。海特坎普获得了北达科他大学的学士学位和刘易斯克拉克法学院的法学博士学位。

马修·波廷格

马修·波廷格(Matthew Pottinger)是和中国新冠病毒无党派委员会的成员。

他还是胡佛研究所的杰出客座研究员和民主防御基金会中国项目主席。2019年至2021年,波廷格在唐纳德·J·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担任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在此之前,他曾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领导政府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工作及其对华政策的转变。



波廷格是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曾于2007年至2010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战。1998年至2005年,他曾担任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

波廷格毕业于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他也是2024年出版的《沸腾的护城河:保卫台湾的紧急措施》一书的合著者和编辑。

杰米·梅茨尔

杰米·梅茨尔是和中国 COVID-19 无党派委员会成员。他是一位领先的技术和医疗保健未来学家,全球社会运动OneShared.World的创始人和主席,大西洋理事会的高级研究员,NextMed Health 的教员和奇点大学的专家。他的公共服务经历丰富多彩,曾在克林顿政府期间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任职,在当时的主席乔·拜登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任职,并在柬埔寨的联合国任职。



梅茨尔被任命为世界卫生组织人类基因组编辑专家顾问委员会成员。他著述颇丰,著述颇丰,包括但不限于《超融合:遗传学、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革命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工作和世界》和《破解达尔文:基因工程与人类的未来》。

梅茨尔担任多家生物技术公司和其他公司的顾问委员会成员。他拥有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哈佛大学法学学位和布朗大学学士学位。

约翰·柳

John Yoo 是

中国和 COVID-19 无党派委员会。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Emanuel Heller 法学教授,也是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公民领导力学院的杰出客座教授。他还是



美国企业研究所。

他曾任美国司法部官员,负责9/11事件后的国家安全和恐怖主义问题,并担任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总法律顾问。他之前曾担任最高法院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和联邦上诉法官劳伦斯·西尔伯曼的书记员。

他是《政治上不正确的最高法院指南》(与罗伯特·德拉亨蒂合著)、《捍卫者总司令:特朗普争夺总统权力》和《攻击点:预防性战争、国际法和全球福利》的作者。他还是多家新闻媒体的定期撰稿人,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100多篇文章。

Yoo 教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

毕业于哈佛大学。

罗伯特·雷德菲尔德

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博士是著名病毒学家,曾于2018年至2021年担任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和有毒物质和疾病登记署署长。



Redfield博士目前是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的兼职教授。30多年来,他一直是一位积极从事人类慢性病毒感染和传染病(尤其是艾滋病毒)临床研究和临床护理的公共卫生领袖。他曾担任美国军方艾滋病毒研究项目逆转录病毒研究部的创始主任,并在美国陆军医疗队服役20年后退休。服役结束后,他与William Blattner博士和Robert C. Gallo博士共同创立了马里兰大学人类病毒学研究所,并担任马里兰大学医学院传染病科主任和医学副主任。Redfield博士为艾滋病毒的科学认识做出了几项重要的早期贡献,包括证明异性恋传播的重要性、开发艾滋病毒感染的Walter Reed分期系统以及证明艾滋病毒感染各个阶段都存在活跃的复制。

除了研究工作外,雷德菲尔德博士还负责监督一项广泛的临床项目,为5,000多名患者提供HIV护理和治疗

在巴尔的摩/华盛顿特区社区。雷德菲尔德博士于 2005 年至 2009 年担任总统艾滋病病毒/艾滋病顾问委员会成员,并于 2006 年至 2009 年被任命为国际小组委员会主席。他曾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艾滋病研究咨询委员会办公室、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福格蒂国际中心咨询委员会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抗感染药物咨询委员会成员。

雷德菲尔德博士于 1973 年获得乔治城大学文理学院理学学士学位。随后,他进入乔治城大学医学院,并于 1977 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罗伯特·卡德莱克

罗伯特·卡德莱克博士是和中国 COVID-19 无党派委员会成员。他的职业生涯致力于生物防御和公共卫生,并担任参议员理查德·伯尔的流行病防范和生物安全高级政策顾问。卡德莱克博士还曾在国防部和白宫任职,并于 2017 年至 2021 年在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担任防范助理部长。



Kadlec 博士拥有美国空军学院的学士学位、美国军医大学的医学博士和热带医学与卫生学硕士学位、乔治城大学的国家安全研究硕士学位、以及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的荣誉理学博士学位。

大卫·费思

戴维·费思是中国和 COVID-19 无党派委员会成员。他还是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兼职高级研究员。费思于 2019 年至 2021 年任职于美国国务院东亚局,包括担任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负责监督多边事务办公室和地区与安全政策办公室。费思还于 2017 年至 2019 年担任国务卿政策规划人员,就与中国和印度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关系提供咨询,并因此获得高级荣誉奖。



费思曾就职于《华尔街日报》, 2013 年至 2017 年担任驻香港社论撰稿人, 2010 年至 2013 年担任驻纽约专栏编辑。他还曾担任美国空军顾问,并于 2011 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教导美国:公民教育案例》的书。他曾在美国参议院和美国众议院作证,并在《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外交事务》、《评论》和其他出版物上发表过文章。他拥有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

致谢

美国传统基金会中国与新冠肺炎疫情无党派委员会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编写这份报告的重要工作的人。

首先,我们必须感谢美国传统基金会主席凯文·罗伯茨博士,以及基金会的领导层,包括执行副总裁德里克·摩根、首席运营官埃里克·科苏瓦尔、幕僚长韦斯·库珀史密斯、凯瑟琳和谢尔比·卡勒姆·戴维斯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研究所主席维多利亚·科茨博士、国内政策副总裁罗杰·塞韦里诺、宪政研究所副总裁约翰·马尔科姆、政府关系副总裁埃里克·蒂塞尔和战略传播副总裁玛丽·沃特,是他们让这次研讨会成为可能。

同时还要衷心感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杰夫·史密斯、监督项目主任迈克·豪威尔、数据分析中心主任帕克·谢泼德、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艾琳·沃尔什、埃德温·米斯三世法律和司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查尔斯·史汀生、执行副总裁办公室杰出研究员史蒂文·布拉德伯里、监督项目总法律顾问凯尔·布鲁斯南、法学博士萨姆·杜威和埃德温·米斯三世法律和司法研究中心法律研究员杰克·菲茨亨利等专家学者。

高级编辑 William T. Poole、Policy 出版物总监 Therese Pennefather、Policy 制作网络开发和印刷制作经理 Jay Simon、Policy 数据图形服务制作经理 John Fleming 和营销总监 Elizabeth Fender,以及 Matthew Tragesser、Jeremy Hayes、Brian Gottstein、Crystal Boham、Ericka Morris、Andrew Harding、Kathy Gudgel、Ilan Hulkower、Elliot Nazar 和 Molly Black 都为该项目的圆满完成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最后,我们要向提供宝贵建议的外部专家表示感谢,包括 Alina Chan 博士、Gary Osen 和 Gilles Demaneuf。

约翰·拉特克利夫
主席

中国和新冠肺炎疫情无党派委员会

华盛顿特区

2024 年 7 月